

蒙山沂水的歌者

——序高明《那年,放电影》

高明是我结识近二十年的文友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,我和王光明赴临沂地区采写《沂蒙九章》时,时任临沂地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他,曾陪同我们四个月之久。他为人热情和坦诚,工作的干练和认真,看待问题的敏锐和深刻,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
高明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他初中毕业时正值“文革”,刚14岁的他,就到临沂半导体厂做工,还不到参军的年龄,就踮着脚尖去体检并有幸通过。投身军旅后,他在大西北、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生前所在部队的军营里,度过了十五个寒暑。当时,由红、蓝、黄三原色染成的国防绿,给了他自豪的荣耀,也使他懂得了职守和责任。1986年底,他作为营职干部转业回到故土临沂后,自小就喜文舞墨的他,很快就在新闻战线上闪烁其华。我们与他初识时,他已是临沂乃至山东新闻界的佼佼者,并多次获得省以上新闻大奖。后来,我又见到他有以宣传沂蒙为主调的新闻、通讯、随笔联翩问世。应该说,他为讴歌老区人民的善良、勤劳、奉献、创业等诸多高尚品质,为弘扬沂蒙精神做出了有目共睹、功不可没的贡献。

近些年,高明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,他见缝插针,忙里偷闲,笔不停挥,先后有《沂蒙山的回响》、《沂蒙采风》、《回

望沂蒙》等集子出版;最近,二十多万言的散文集《那年,放电影》又即将付梓。灵感从不拜访懒惰的客人,高明创作的勤奋令我哑舌。

散文是文人喜爱的体裁。散文举要治繁,含宏万汇。高可到九天摘星,低可到沧海猎珍,大可拥抱三山五岳,小可掇拾泪珠一滴。散文的触角无所不包,无所不亲。高明亲睹、亲闻、亲察、亲历了沂蒙新时期以来的大变迁、大变革、大发展,我们从他之《沂蒙山的回响》中的诸多文章里,可依稀听到世纪大潮撞击老区人民心灵堤岸所发出的回声。故土情结是人类诸多情感中的重要情愫。故土如同胎记,深嵌在每个人的肌肤上;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故乡,遑论公忠体国!高明多年在市委宣传部供职和任临沂市文联主席、市旅游局长期间,对沂蒙的山川风物,了然于胸。他挚爱着这里的一山一河,一峰一岗,一瀑一溪,一园一林,一庙一寺,一鸟一石。他的《沂蒙采风》饱含深情地向读者展现了沂蒙风土人情的醇厚质朴,和山川原野的壮美秀丽。

《那年,放电影》一书,是高明近年来散文写作的新成果,代表了他散文创作的新成就。书中有数篇作品追忆了他军旅生涯中的所见所闻。沉淀的感情一旦被

新生活的浪花搅动,抚今追昔,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良知,是人类心匣中最宝贵的珍珠;良知,更是作家心灵杯盏中最圣洁的玉液。《那年,放电影》追忆的是昔时高明在部队任电影放映员时,随部队野营拉练为山村老百姓放映革命样板戏时所发生的事情:几个“地富反坏”分子在帮电影组挂好银幕、清理完场地、架好机器后,即被驱逐出场,当放映结束后高明才从前来收拾机器、打扫现场的“四类分子”口中得知,他们是隔着一架山,躲在山沟里听着唱腔度过的……这则故事听来简单,却在高明心灵的回音壁上刻下了永难消灭的音符。高明在娓娓的诉说中,留给读者的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,是人们命运的悲怆与凄凉。文学作品若不关注人生之多艰,是很难触及“世道良心”的。《卖鸡蛋的小姑娘》一文,记叙的是陕西关中某山村一娴静秀美的姑娘,家中因生活所迫,父亲将其许嫁给一个年纪大地十多岁的瘸子。一天,这姑娘因鸡蛋卖不掉,竟眼泪汪汪地望看过往行人。其时已是西安陆军学院干部队学员班长的高明见状,遂掏钱将鸡蛋全部买下来……前几年,高明到内蒙古去参加北方旅游交易会,与当年卖鸡蛋的小姑娘邂逅;此时,她已成为某旅游公司的副总……人类的历史总是在

耐心等待着于“零度状态”生活的最低层的民众去获得福音。高明在凄美的文字描述里,给了我们关于生活、命运、人性、人情的无尽思索。

我曾和高明交谈过,散文易写难工。将没有呼息、没有知觉的汉字小方块,排列成稍大一点的方块,并鼓捣得活蹦乱跳,明智达理,魂牵梦绕,实任不易。几天前,高明打电话告诉我,近几年,他认真学习、研究诗词歌赋,并对临沂的灿烂文化、历史掌故也极有兴趣。在读了他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“百城赋”栏目中的《临沂赋》后,从他那辞采飞扬、顿挫有致的诵吟里,我感到他的学养在提升;收录书中的,在《人民日报》文艺副刊发表的《临沂建城记》,贯通古今、条分缕析地叙述临沂城市建设的天缘、地缘、人缘和风神脉息,读来使我感到高明的学问和文学修养在大进。

高明是时代的歌者,是蒙山沂水的歌者。他有丰富的文学素材和“库存”,又有对家乡父老的一腔赤诚,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,他会写出更为精美的散文。

是为序。

李存葆
2010年大暑之日于济南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全国政协委员,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,少将。)

